

# 用文学的形式为时代楷模立言

——纪实文学《治沙愚公》创作谈 □陈玉福

2018年下半年，我接受任务到八步沙林场采访，主要是创作电影剧本《八步沙》，可在采访、搜集材料的日子里，我一次次地被郭万刚这位伟大的传奇式人物所感动。我想，一部电影怎么可能把闪光的“八步沙”精神表现出来呢？于是，我决定用小说和纪实文学的手法把《治沙愚公》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八步沙，学习八步沙。2019年的春节我没有休息，到了正月初六，我不但完成了电影剧本《八步沙》的创作，而且《中国作家》杂志也决定在2019年第三期头条位置发表这部电影剧本。同年3月27日，当我拿到散发着墨香的《中国作家》杂志时，中宣部表彰“八步沙老汉三代人”为时代楷模的文件也下发了；同年5月，长篇小说《八步沙》正式出版；同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了八步沙，提出了新时代愚公精神；同年底，电影剧本《八步沙》获得了《中国作家》优秀电影剧本奖，同时入围中国基金会2020年十大电影剧本扶持；去年7月、12月，影视剧《八步沙》杀青，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片，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创作纪实文学《治沙愚公》时，我感觉非常难，我第11次到八步沙采访时是风景宜人、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秋天。可几十年前的八步沙就是一片沙漠，试想一下，一大片看不到边的沙漠，加上6个老汉，还有那头拉水的毛驴，这本身就乏味无比，写一个这样的现实题材的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还可以，因为这两个文体可以虚构。可要写一部30万字的纪实文学，那感觉就难了。

其实，最难的不只是一种创作心态，还是一种选择。我们都知道，在写作领域里有两大块领域不好写，一块是现实题材，一块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我从小受主流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喜欢英雄主义的作品。所以这样的喜好也就成了我的创作习惯和创作努力的方向。写《烽火陕甘宁》是如此，写《建军大业》《热血军旗》《共和国长子》等就更是如此了。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还有现成的重大历史可以借鉴，可写八步沙就不同了，要写非常平凡的人物，要写枯燥乏味的沙漠，写历史题材作品，最大的风险是你在不经意间歪曲了历史，或者是曲解了历史人物。写现实题材最大的风险是闭门造车，距离我们的现实太远。我是一个学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让我写序推荐一下，说是某国家级出版社已经定稿了马上要出版。我一听这家出版社来头不小，就感觉作品也一定不错，就答应先看稿件再说写序的事，结果看了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描写的家乡除了地域外，几乎所有的细节都严重失真。我给他列举了10处败笔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细节的失真会导致一部作品的失败。

当然了，每一个作家都喜欢写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几乎是一个写作定律了。但无论你写什么样的题材，首要的问题是你这个作品要接地气，不要跟现实距离太远。

为了创作《治沙愚公》，我通过查阅资料得知，从2000年到2018年的18年间，世界绿地增加的面积里有25%以上的绿地来自中国。联合国还有一个千年计划，计划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绿化荒漠。从这个意义上讲，八步沙老汉三代人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绿化了近40万亩沙漠，这是何其大的

功绩啊！而作家要发现这个“功绩”，蹲在象牙塔里是不行的。因此，作家要沉下去，到最基层去，去发现“功绩”里的点点滴滴。

一句话，作家要有在最为普遍的事件中发现伟大的能力，要用世界的眼光发现身边英雄人物的“善良”和“伟大”。也许八步沙人在最初的艰难地治沙造林过程中，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伟大，更想不到他们的行为就是英雄行为，但保护家园和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个初心和“善良”，是原始的，是无私的，是伟大的。

他们最初的行为只是一种“小我”的表现，是为了吃上饭和出于保护家园的一种本能，在治沙造林过程中，他们的思想才逐步得到了升华。正是因为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这群普普通通的平凡人，才能成长为英雄和楷模。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的第一句话都惊人的一致：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沙乡人应该做的事情。从他们腼腆、憨厚的笑容里，我敏感地发现，他们身上一定有许许多多与众不同的精彩故事。而这些故事，只有在你锲而不舍的“采访”中，才能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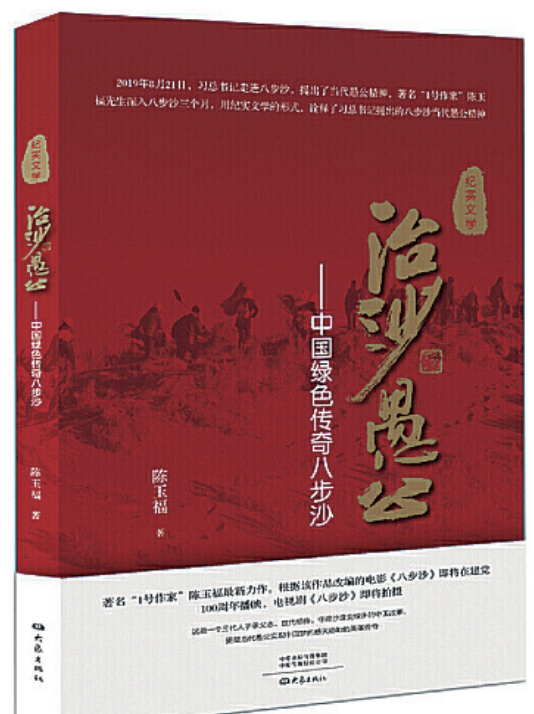
一个作家如果在生活中发现了真善美，就必须把她写出来。因为，一切真善美，文学都没有理由缺席。

这之后，我一个猛子扎进了八步沙，在采访的过程中，慢慢地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朋友之间的谈话是发自心灵的谈话，于是，六老汉和他们的后代六兄弟的治沙造林事迹，还有第三代青年人的作为才一次次地感动着我。于是，我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30万字的纪实文学初稿。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很明确，我要为这些最为普通的治沙人树碑，为他们的高尚和伟大立传，为习近平总书记“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理念叫好！为世界新增加的绿地中25%以上的面积来自中国鼓与呼！

我的采访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当地宣传部、文化部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大张旗鼓地去采访，一种是悄悄地去，不惊动任何人，默默地到八步沙深处，坐在沙丘上，或在沙漠里转悠，去认识八步沙，去体会八步沙人治沙的感觉。最后去八步沙采访的时候是冬天，虽然刚刚下过雪，但不少的沙丘或者是草地上的雪已经融化了。我把车开进去，从后备箱里取出棉衣棉鞋，找一个朝着阳光的没有积雪的地方，静静地躺下，闻着沙漠的味道，感受着沙漠的气息，倾听着沙漠的声音，触摸着沙漠的脉搏……久而久之，好像与八步沙有了某种默契。沙漠的味道是清新而又纯粹的，沙漠的气息是粗犷而又复杂的，沙漠的声音是安静而又悦耳的，沙漠的脉搏是舒缓有力而又奔放激荡的……

这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了八步沙老汉三代人的影子，还有他们抽着旱烟的味道、吼着花儿和凉州贤者的声音，还有滚烫的心灵……

这样到八步沙若干次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真的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他们的事业和八步沙，也爱上了八步沙的一草一木，包括那些正在融化的雪，似乎那不是雪，而是大画家笔下的素描。那已经化掉雪的书包和车辙印迹，就像一幅素描的主干，像极了一串串树叶或一片片花瓣。而已经化掉的雪痕和没有化掉的雪交界处，就像主干的枝杈蔓延，或者树叶、花瓣的肌肉……于是我想，如果在空中拍照，一定会拍



出特别漂亮的照片来。这时候，我就知道，纪实文学《治沙愚公》我一定能够写出来。这感觉就像我曾经写《建军大业》《热血军旗》《烽火陕甘宁》一样。我的体会是，你不崇拜你的主人公，你就写不好他，你不喜欢这块土地，你一定写不好主人公生存的环境。我写影视剧《建军大业》时，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我不崇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伟人，我一定不会写出《建军大业》和《热血军旗》来的。同样的道理，我如果不崇拜习仲勋、刘子丹、谢子长这些英雄，那我是决然写不出《烽火陕甘宁》来的。写《西部人》《西凉马超》《女人的抗战》等作品的时候，我亦是这种感觉。

通过《治沙愚公》的创作，我感觉到非写不可的地步，一定不要轻易动笔，否则，你的创作一定是失败的。2014年以前，我在北京是“北漂”一族，为了创作《建军大业》我驾车实地到毛泽东指挥长沙起义的地方到三湾改编等地区，再到井冈山，还有朱德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三河坝阻击战，再到井冈山的资料，这才找到了创作《建军大业》的灵感。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到作家与体验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如果说写历史题材作品研究历史、查阅资料是第一要务的话（为了查阅《建军大业》的资料，我曾经在国家图书馆附近花8000元租了一套房子，整整在图书馆泡了三个月），那到现场体验生活便是不可或缺的过程，这就像找一个对象结婚一样，对方只要是异性，皆可与他（她）结婚，可如果不了解对方，稀里糊涂地就结婚，那这桩婚姻十之八九是失败的。所以文学创作中的体验生活，就像结婚前了解对方一样，你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行。

创作纪实文学《治沙愚公》的时候，我通过研究资料、体验生活，已经对八步沙特别的热悉了，才开始创作。结果，文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才有了今天这部还算满意的作品！



是从哪里来的 写出了好人 □胡平

经过全国性表彰的绝大多数先进单位和个人，都有过硬的事迹，都值得写报告文学。傅宁军的《心中的旗帜》就内容来说也是很过硬的。

作品的主题是好人，一个集体的好人。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共产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一个是退役军人中的先进模范，两者加起来，使作品在题材上很有价值。

生活中做一个好人，被大家背后称为好人，其实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我年轻时听有个邻居常说：“人都是坏的”，她大约遇到过不少伤心事。但电力服务队的这些好人是把主动为群众做好事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如他们保证及时赶到维修现场，维修后要把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遇到顾客有特殊生活困难就发起捐助，顾客有困难打电话来唠叨就陪着唠叨等等，一做几十年，都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他们做下来了，当然尤为难能可贵。

傅宁军不愧是一个老作家，很老到，把力量主要用在展现人物而不是叙述事件上。开篇不久就进入对首任队长廖恒生的生平介绍，这和一般同类报告文学的写法略有不同。实际上，整部作品的框架，不是以服务队的工作和贡献为线索的，而是以第一任到第四任队长，以及重要队员的人生轨迹为线索的。这种写法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一个主要人物得到比较精细的刻画，使他们的形象突出，实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主要价值。譬如，写廖恒生在部队当了13年兵，复员到电力服务队后，又看了13年大门，看得兢兢业业，后来当了队长，又干得非常出色。他这个看13年大门就给人印象很深，说明他是个很安分守己的人，不是沽名钓誉的人，这一点就很重要。另一方面，通过写经历，也把退役军人的特色写出来了。

这是写退役军人写得很好的一部作

品。这个服务队以退役军人骨干，作者不放过对他们军旅生涯的详细挖掘，也就写出了他们后来在服务队表现的基础。比如，队里有6位上过老山前线的老兵，经历过最惨烈的战斗，眼见一些战友的牺牲，复员后，他们主动做起了照顾烈士家属的事情，好多年别人都不知道。所以，能够组成这样一支队伍，的确和部队的经历有关。第四任队长郭鹏是1989年出生，没当过兵，但他的父亲也参加过老山战斗，在战场上负责运送尸体，常对他讲这些事。作品也是比较注意写家庭影响的，写出了党员家庭、军人家庭对服务队队员人生观的影响。

因此，作品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写出了好人是从哪里来的，回答了读者更为关心的问题。应该说，作者从采访起心里就有这个意识，把该采访的都采访到了，才能写好这部作品。

虽然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构思这部作品的思路是什么，重点在哪里，但在作品中发表议论并不多，一切都争取由对人物和事件的写照中自然流露，让读者领悟，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有议论的地方，议论得很精，字数很少，比如作者在结尾处为这个服务队做了一段总结，说：“在军营当一个好兵，在地方做一个好人。坚定信念，绝不放弃，用共产党员退役军人的家国情怀，影响着身边的同龄人与后来者，诠释了‘中国好人’的深邃意义，铸就了军魂辉映的坚强团队。”仔细看，这段话的确能够概括全篇的所有内容，是相当精练和准确的，也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性。

作品结构比较严整。比如说，作品从首任队长写到现在队长，一直避免写到后者淡化前者。经常在介绍后任时提到前任，最后部分还写到前任队长们的现在进行时，后续的贡献，这样在结构上也体现了作者的功力。

在对边凌涵发表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的《暗涌》进行相关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可能要认识到，这是一篇多少有些“在潮流之外”的小说，尤其是在现如今颇为激烈而又异常吊诡的性别议题之下，《暗涌》似乎所取的是另一条“路径”。但对照所见的部分青年小说家及其作品暴露出的局限，边凌涵短篇小说《暗涌》体现出的“在潮流之外”特质又显然是值得言说的。

假如将小说创作理解为文字形式层面的几何证明题，《暗涌》提供的“论证条件”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疲乏与缄默交织的婚姻关系、时隐时现而又充满矛盾的幻觉、惶惶然的人生前景……这些内容其实也是众多敏感的青年写作者在不断触碰并试图将之转换为小说“论证条件”的现实碎片。这其中，小说人物在特定空间环境中的身份意识是个需要特别注意到的问题。联系现今被频频提及的“女性写作”及相关文本，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数量不在少数的青年写作者习惯于在涉及个体“疲态化”情感关系结构的小说里塑造“否定一切”“逃离一切”的女性人物，但这些女性人物的身份认同感却又往往是缺失的，相反，她们往往选择抗拒或撕毁施加于自身的身份标签（不管这些身份标签合理或不合理），而女性人物相应的抗拒行为却也可能同时抹除掉那些本就属于女性的身份论争（由此看来，那些声势浩大的女性写作立场，很多时候难道不是走向歧途的“反命题游戏”？！），这是《暗涌》与上述言及的文本现象相区别（也是这篇小说容易引发读者思考）的地方。《暗涌》中，“母亲”这一身份成为牵扯全职太太唐翎与外部社会之间联系的“引线”。可以看到，尽管小说以颇为细腻的笔法去描写唐翎的家庭生活与婚姻状况所出现的裂缝，但其作为“母亲”的身份意识却自始至终都是得到自我确认的。也正是出于对自己的“母亲”身份及其角色情感功能的履行与维护，唐翎在一种趋于驱动的潮流氛围中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尤其是《暗涌》结尾处丈夫易成显为妻子将其“左手无名指的戒指往上推到指根，转了一圈”这饶有意味的行为，正是在论证《暗涌》这道“几

何证明题”关乎女性之门宽广与否的“结论”。

不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小说《暗涌》进行考察，也许是合理、却并非唯一的切入点，因为个体在现实世界当中对于自我身份角色的探索挖掘，其复杂程度显然超越常规认知经验的性别立论。我们谈到《暗涌》之于当下部分青年写作特征所流露出的“在潮流之外”（包括这种“在潮流之外”的价值），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基于小说主人公唐翎对于自己所具有的身份角色的认知与实践，并未陷入到现今一些小说涉及及女性书写所出现的“因抗拒而抗拒”的偏见泥潭。尽管小说《暗涌》的若干细节也在表明唐翎在扮演相关角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略显消极的情绪，也会感受到自我角色之于现实或是未来走向的不可控性：“……她也不排斥眼下这个阶段，毕竟过去、现在、将来，反正全由不得自己作主，该来的会来，要走的也留不住。”除此之外，身为“母亲”的唐翎需要为自己所担负的角色与角色所呼应的情感对象（女儿、丈夫）主动远离很多心向往之的领域，唐翎放弃学习烘焙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是怕花钱，而是唐翎担心万一爱上烘焙，必将以牺牲一些别的东西为代价。”但就如同作者通过小说各种场景设置所想要表达的，个体在确立或舍弃某一类特定身份角色时，事实上也是借此重新审视涉价值选择层面的“取”与“舍”。“取”与“舍”不仅触及个体本身，也影响到个体与他人、个体与时代社会之间情感互动的构成途径、构成形式、构成有效性。

《暗涌》里有一处颇为玩味的细节：唐翎曾尝试通过写作的方式去模拟、靠近那些自己尚未能够切身感受的空间领域与身份角色，但唐翎于这一过程逐渐形成的疑问，或许也是作者边凌涵本人在写作中现存的困惑，她们的文字最终未必是在验证虚构的画面能否成为现实的倒影，而因循着现实与虚拟之间边界的游移则让她们意识到自己在小说世界里所掌握的“虚构之力”的有限性，“她的故事不属于她，即使从表面上看是她创造的，她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载体、一种媒介，人物借由她穿行，事件借由她生发，但离开了她，它

们一样在另外的世界里，不慌不忙、落落大方。她比任何人都更想改变一些事的结局。但是，面对满纸荒唐言，不是她不想做什么，而是她根本做不了什么。”但另一方面，结合唐翎之后对于写作这一行为的兴趣骤减的观念变化，这也许是唐翎本人不再愿意让自己受制于缥缈不定的小说世界的引诱（即使这个小说世界是由她本人设计的），因为她于现实环境里具备的角色身份已然提供了真切的意义与依据，来自现实世界的情感联系与情感诉求令其从某种不可名状的有限与渺小中挣脱出来，尔后转向更为宽广的天地。唐翎也借由相应身份角色的彰显、相应身份角色背后社群机制的自我认同，试图赋予卑琐的日常生活景观以新的期许。

从“模拟想象”到“回归现实”，这也涉及到唐翎作为“母亲”“妻子”等现实身份角色之下的情感功能的重新激活，唐翎、易成显一家在女儿幼儿园元旦晚会上的童话剧表演则成为其间饶有意味的时刻。不管是唐翎，亦或易成显，都从童话剧表演的角色扮演中体察到彼此现实身份所涉及的情感功能与实践行为之于家庭结构的不可或缺。《暗涌》探讨的不是人如何抗拒或摆脱所附着的身身份角色，而是相关个体或群体通过撕开日常视界营造出的经验假象，汲取到真正能够匹配所属身份角色的情感意识的维系基础与动力来源。很显然，唐翎这一人物形象在作者所加以设定的时空背景下的生命光芒也体现于此。而不断形成自我身份认同感的唐翎，似乎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伍尔夫长篇小说《到灯塔去》的拉姆齐夫人。尽管唐翎与拉姆齐夫人对应的是截然不同的叙事情境，但这两个女性人物及其生命轨迹皆旨在强调，人的身份的确立绝非一切的结果，因为更重要的是，具有高度身份认同感的个体如何将自己的生命光芒聚束为影响、甚至改变身边人的精神灯塔，且这一精神灯塔的意义并不限定于“现在”，当我们看到拉姆齐先生在妻子离世后带着儿女前往那个曾经被不断提起而未至的灯塔，并在情感层面获得了某种归宿；或是唐翎在经历情感波动与欲望游移之后的回归对于其“小家”的意义，便可知那些未可期的“光”或将在“未来”形成异常温暖的召唤，鼓舞着她们身边的人“到灯塔去”。

吕素玲《云窗听月》

# 元宵听月是梅花

□郭顺敏

吕素玲的诗词，写得工稳精严、清新雅致、绵柔飘逸，体现了深厚的文学功底、精纯的艺术造诣和卓越的个人禀赋。

王国维有言：“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强调“形式之美”是就艺术而言的，她与思想之美并不矛盾。诗人运用形象思维和诗性思维，把精神上追求高雅与生活中讲究情理，完美地融合进诗词的艺术之中，从诗词中获取一种悲天悯人的生活态度和超然物外的圣洁理想，以艺术的眼光对待人生，安顿心灵，进而达到沟通“天人”的独特语言与艺术密码。这是诗人所追求的一种高雅的境界。

素玲在诗词创作中是深谙“推敲”三昧的。卷首一个“听月”的“听”字，便极尽动词的妙用，使其诗集内外呼应，气脉流畅，产生一种情境美、意象美、流动美，此用可谓视听夺人，出奇的妙。还有诗中如“每借雨琴听瘦”（《浣溪沙·咏桃花》）、“已听小草叩门声”（《早春絮语其三》）等句，无一不是透过动词“听”字，让我们得以窥见诗人孤高、清寂之心境，也可以品味出诗人聆听檐雨敲石的声音以慰相思、稍解寂寥的淡淡喜悦。

月亮是阴柔之美的象征，自远古图腾崇拜传承至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丰富、最唯美、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凝聚着历代中国人的生命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素玲写道：“月自中天瘦尽，幽幽不教人知”。（《清平乐·不教人知》）不教人知我深知，此时此刻，我仿佛同她一起望着月亮，寻心悟道，潜幽沉思，参破人间悲欢，散落一地的感喟。

素玲的咏絮诗亦超凡脱俗，别有意味，如《鹧鸪天·咏絮》：清影沾襟一片凉，风中叠起九回肠。远舟无处无从问，荒草丛边几许伤。泊野水，倚斜阳，凋零不见入苍茫。轻盈惹惹离人怨，临别题诗赠一行。这首咏絮词，凄楚婉约，词短情长，颇有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断肠词》之风韵，读来令人泪目唏嘘。于是我不禁想到《红楼梦》里最著名的两首咏絮词，

一首是林黛玉的《唐多令》，另一首是薛宝钗的《临江仙》，两首词都暗含了人物的身世命运。大凡咏物词，意必有寄托。这首词咏味为柳絮，拟乃作者对个人身世的自怜与感慨，以双关语和拟人手法托物寄怀，借柳絮飘飞写离人愁思，物我同化，让自然景物与自己共担人生的悲愁。词中的凉、荒、伤、凋零、怨，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都令人涵咏不尽。

素玲的诗词并非清一色凄凄惨惨、哀哀怨怨之作，我对素玲诗词的偏爱与倾心，首先是被其作品中所呈现的清灵意境、典雅韵味、真挚情感以及那些撞击人心、生动传神的诗句所感染和感动。她做到了知古、尊古、师古，而非复古、仿古、泥古，进而使其作品呈现出题材广泛、至美向善、凝练高致、清雅旷达的风格特点和审美倾向，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我深深佩服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关于“弱德之美”的意旨，受此启发，认为素玲的原创诗词与精神气质同样具有这种弱德之美。弱德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坚强的信念和持守，叶嘉莹先生就是靠着这种精神力量度过了很多艰难困苦，实现了自己“把余年都交给国家”，把一切都“交付给诗词”的人生夙愿。素玲在孤身一人、长夜难换的岁月里，也是因了诗词的呵护与陪伴，才得以战胜各种人生苦难的。对叶嘉莹先生弱德之美的传扬，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牵系。有了这种牵系，就有了千千万万的传承，中华文化就能扎根于更多人的心中，中华诗词的生命也将永恒。

最后，用我心仪的素玲的一首七律诗结束此文。值此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愿我们共同享受和见证诗词带给我们的这份宁静、纯净与美好，真诚祝福中华诗词之树长青！

景物回春绿柳柔，流光偷换又花朝。吟边小字随心起，客里浮名着意消。静室题诗当逸逸，闲窗读易得逍遥。腹中尚有些微墨，气宇于今不肯凋。

——《三八妇女节抒怀》